

华北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

——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华北的阴谋

佟冬 解学诗

华北事变，是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吞华北而制造的一系列事件的总称。这些连锁性的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继续，关东军是事变的主谋，东北沦陷区为事变的策源地。因此，把日本对东北和华北的侵略联系起来研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发展过程。

(一)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关东军制造了天津事变，人们知道那是为了把溥仪偷运出津；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即制造华北全面暴乱。因此，应该说华北事变始于天津事变。如今事实已经清楚：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是在东北和华北同时下手的。在华北的主要目标是吃掉张学良在那里的两个集团军^①和华北整块地盘。天津事变前四天，1931年11月4日关东军曾明确地向驻华各地日军机关通报了它的华北谋略方针：“打倒张学良，建立华北政权和同南方的缓冲地带”，并“把东北置于华北政权之下”。^②这乃是土肥原的旧题新作。两个月前，1931年8月，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企

① 这些部队是为解决中原大战和平息石友三叛乱而入关的，其具体编制番号参见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一书。

②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243页。

图利用石友三之乱，消灭张学良的势力”^①，为此特把蛰居大连的阎锡山找回山西，妄图使之结成阎、石（友三）、韩（复榘）反张同盟，联合攻击在华北的东北军。关东军则利用这个“绝好机会”准备提前动武。可是，当8月5日阎锡山飞回山西时，石友三叛军已被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在石家庄一带和滹沱河沿岸打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幕后操纵者土肥原也只好悻悻然溜回奉天特务机关。此次，10月10日土肥原卷土重来，是衔着双重谋略任务的。为此，他除了操纵失意军人张璧和石友三部下李际春外，还收买了杨元吉一伙匪徒。然而，当11月8日挑起天津事变时，由于土肥原事先准备失误，张、李便衣队抢先发动，致使杨元吉一伙来不及参与，结果未能象预先策划的那样，占领天津各要冲，破坏杨村铁桥，接应韩复榘，酿成席卷华北的大暴动。^②关东军虽曾赶忙输血打气，紧急增拨枪支和钱款，一度受挫重又猖狂起来的便衣队确也给华北造成不小的损害和骚扰，但终因寡不敌众，暴乱很快被平息。^③侵略者只是得以把溥仪偷运出津，即部分地达到了目的，自然是不会甘心的。

1932年，日本侵略者先是忙于拼凑伪满傀儡政权，接着以大批兵力妄图扑灭松辽大地到处点燃的抗日烽火。到了年末，以黑龙江省军和吉林自卫军严重受挫，和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转进苏联为标志，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转入低潮。于是关东军把矛头指向热河。那里他们曾妄图不战而取，未逞。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个两面人物，既同日伪勾搭^④，又听命于张学良。

① 1943年12月27日土肥原在东部司令部的谈话记录。见《土肥原秘录》。

② 10月初关东军就策划利用韩复榘攻击张学良的东北军，为此计划曾给韩步枪10000支。

③ 13日便衣队被击退，但时断时续活动到20日。11月27日第二次暴动，即所谓第二次天津事变，29日被平息。

④ 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召开所谓建国会议时汤致电“服从”，后被任命为伪参议府副议长，未到任。

而热河又是各路义勇军的云集地^①，再加上部署在长城内外的东北军和中央军，那里被日本侵略者视为巩固伪满殖民统治和扩大侵华的障碍，必欲拔之而后快。但关东军的此次行动，目标不限于热河。1933年2月23日关东军司令官在“声明”中露骨地宣称：

“如果华北政权对我采取积极的实力行动时，则不能不引起战祸及于华北。”^②因此，关东军作为进攻前的战略步骤，制造了山海关事件，夺取了关内外咽喉山海关，其办法与阴谋爆炸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如出一辙。

进攻热河之战是在关东军司令官发表“声明”的当天开始的。主力是第八师团和第六师团，此外还有混成第十四旅团、张海鹏伪军及其他伪匪军。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其不抵抗政策，因为眼看日本侵略者打到鼻子底下了。但是，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中国守军却节节败退。特别是各路义勇军指挥的不统一，成了导致全线动摇的重要因素。坐镇承德的汤玉麟早已魂不附体，3月4日弃城南逃。热河的迅速失守，致使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被迫下野，汤玉麟遭受通缉。而有恃无恐的关东军，在占领承德的三天后，3月7日即向长城各口展开进攻。

但华北不比热河。当时部署在长城沿线的华北军、东北军、山西军、中央军、义勇军，加上平津驻军，共有20个师进行抵抗，关东军的进攻并不那么顺利。^③3月中旬在罗文峪，4月10日

-
- ① 据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热河讨伐经过概要》载，热河省境内抗日军达13.5万人。
 - ② 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热河讨伐经过概要》，5—6页。在关东军司令官发表“声明”的同一天，日本还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
 - ③ 华北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主力守卫长城以南的玉田和三河，商震军在警戒山海关和海上的同时，主力置于滦河一线；山西军以张家口为中心向古北口热河以西部署；此外，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北上，其中一个师已用于古北口。

在冷口，4月21日在南天门等地都曾发生过激烈战斗。不过，中国军队还是不断地败退。5月中旬，正当日军采用当年攻打旅顺的办法围攻密云的时候，中国守军指挥者已不组织抵抗，下令退却。

关东军在疯狂进攻的同时，还紧张地大搞政治谋略。活动中枢是天津特务机关，核心人物是来自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指挥自当是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参谋本部。他们指使张敬尧^①一伙发动政变，制造亲日政权。第一次拟于4月27日发动，未遂；5月初，日本参谋本部又执意实施军事行动“辅助手段的华北施策”^②，结果因走狗张敬尧5月7日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被暗杀而归于失败。

国民政府当局既慑于关东军的疯狂进攻，又恐惧天津特务机关制造的华北反蒋空气，故早在4月27日南天门失陷的时候，即通过日本驻沪武官试探停战的可能性。亲日派何应钦在热河陷落后取代张学良任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5月4日又有老亲日派、已退居数年的非国民党员黄郛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以紧急推动停战。5月中旬何应钦即已同逼近平津的关东军暗中接触。5月21日何应钦、黄郛等密电蒋介石、汪精卫：“连日与对方迭次接洽。……拟请政府即将我军希冀和平、自动撤退情形，酌量通告各国，以为将来地步。”^③密电中虽然还说针对日方“态度陡变”的情势，“积极准备于白河附近决一死战”，实际上屈膝求和的大政方针业经确定。5月22日午夜黄郛闻讯23日拂晓日军将“大举进攻”，便急忙“赴一私友处，不露声色，与中山代永津

① 张敬尧，又名勋臣，1880年生，安徽人。1922年第一次率直战后退从张作霖，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顾问。1926年任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第二军军长。后无军职。

② 1933年5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给关东军参谋长下达之《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543—544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826—2。

陆军武官、藤原海军武官彻夜讨论，天明始归”。^①黄郛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也是因为22日有汪精卫的电示在先。汪电称：“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②汪精卫等人既甘心充当投降派，又生怕沦为被人永世唾骂的千古罪人，所以总企望在停战协定文本上留有余地。^③可是，1933年5月25日当北平军委分会上校参谋徐汉谋前往密云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在停战备忘录签字时，关东军要求中国代表必须到日军部“乞求正式停战”，而且出示的协定只有日文本，并声称无修改余地。^④

1933年5月31日由中方代表熊斌和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署的《塘沽协定》，不但使国民政府“间接承认”了伪满洲国，而且使华北的一大块领土——冀东沦为中国不能行使主权，日方却可以任何方式，包括飞机侦察和“其他方法”进行活动的地区。《协定》还为日军的日后军事侵略埋下伏笔，对所谓的“长城线”并未规定起迄地点。因此，《塘沽协定》的签订理所当然地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

关东军越过长城进犯华北时，李际春、程国瑞、刘桂堂、白坚武、王铁相等数万名各种牌号的伪匪军尾随其后。关东军操纵、利用伪匪军，固然是为了弥补兵力之不足，更重要的是政治谋略之所需。例如，原安徽省长、青帮土匪头子郝鹏和天津事变时的便衣队头子李际春，受关东军唆使，都曾在其盘踞的地区“迫令

① 1933年5月23日黄郛致蒋中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826—2。

② 1933年5月22日汪精卫致黄郛电。同上。

③ 1933年5月24日蒋中正致何应钦等电，对停战“形诸文字”表示不安，特别对东北三省和热河“无意割让之承认尤为可虑”。同上。

④ 关东军司令部《华北停战交涉经过概要》，1933年6月，〔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521页。

商民悬五色旗”，阴谋实行“河北独立”。①停战后他们又被派上新的用场。《塘沽协定》第四条规定，在冀东“非武装区”“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但“不得使用刺激日本军队感情的武装力量”。②1933年7月，经关东军代表和华北政委会代表的大连会议决定，从关东军卵翼的当然不会“刺激日军感情”的李际春“救国军”中抽出4000人，编成各以王铁相和赵日雷为头目的两个保安总队，驻于滦县和丰润。③

(二)

关东军之所以没有攻入平津，也没有继续前进，而接受停战，主要是恐惧英美干涉，同时也不无兵力不足问题。当时日本侵略者的对华战略是：打击抗日军，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建立亲日政权，不战而取全华北。而《塘沽协定》签定后的国民政府无法重提“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而是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开始采取对日绥靖政策。1933年9月庐山会议后，宋子文外长为汪精卫所取代，亲日势力抬头。黄郛、殷同等也在积极为执行《塘沽协定》而奔走。继大连会议和唐山会议之后，经过1933年11月北平会议，1934年春伪满与华北之间实现了通车、通邮，和伪满在长城各口设立关卡。而且，关东军在撤退时不但迫使国民政府同意在山海关、古北口等地保留“关东军指定机关”，还新设了特务机关、宪兵队、警备队等。撤退的部队，例如第六师团也是撤退到临近华北随时可入关的锦州一带。所以，《塘沽协定》后日本侵略华北的阴谋，是以关东军的武力为后盾的，或者

-
- ① 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机密作战日志》，〔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547页；《北平军委会战报》，亦有类似记载。“五色旗”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用过的国旗。
 - ② 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存《塘沽协定》油印日文本译。
 - ③ 关东军司令部《大连会议议事录》，1933年7月6日；关东军参谋部《唐山会议议事录》，1933年7月25日。两件均为油印件。

说，是在关东军的军事威胁与讹诈下进行的。这已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1935年，日本侵略者将华北事变推向高峰，偌大一个华北闹得乌烟瘴气，事件迭起，岌岌可危。年初，关东军一手制造了下面即将说到的察东事件。5月初，日方又借口两名报社社长被杀事件和所谓孙永勤事件进行新的要挟。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涛和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都是亲日份子，他们分别于5月2日晚和5月3日凌晨在北洋饭店和私宅被暗杀身死。孙永勤则是奋战在长城线上的抗日英雄，他所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于1935年2月进入遵化境内。本来，4月20日关东军已通过驻平武官高桥坦通告北平军委分会代理委员长鲍文樾，将自行讨伐，并在24日上午已采取行动。可是，日本侵略者却利用此事和两名报社社长被杀事件，作为向中方发难的借口。1935年5月29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平武官高桥坦访问了北平军委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严重要求“清算蒋介石的二重政策”，提交了由11项要求构成的通牒。其内容包括：从华北撤出东北军、中央军、宪兵三团、国民党；严惩杀人者，赔偿被害人损失；解散排日团体，取缔排日教育；河北省政府迁移保定，等等。与此同时，驻北平武官室还以中国驻屯军名义发表声明称：“日本军基于条约的权力，有必要采取自卫行动。由此而产生的事态，其责任当然由中国方面来负。”^①在上海的矶谷驻华武官也向南京政府采取了同样行动。关东军则表态支持中国驻屯军。顿时软化的国民政府，经过6月1日的临时中央政治会议，6月4日后何应钦答复了酒井参谋长。然而日本政府决定“一举解决过去的一切悬案”。^②因而6月8日酒井又以最后通牒

①②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日中事件的经过》，综合情报10之号外，1935年6月21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存。

形式提出，“将河北全省置于几乎与非武装区同样的状态”，撤回北平军委分会，撤走中央军、东北军和一切杂牌军，解散全国蓝衣社和其他排日团体，并要求6月10日前必须答复。^①实际上，无论是日方的无理还是国民政府的退让，都与关东军重兵压境有关。酒井发出最后通牒的同一天，6月8日关东军突然命令满铁动员人员和设施向山海关火速集结军队。^②军事讹诈果然奏效。9日汪精卫即电示何应钦：“全部答应日方要求”。10日下午，何应钦往访高桥正式回答，此即后来的所谓“何梅协定”。当夜中央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由北平南撤汉口。由此，继冀东之后，国民党军政力量被排除出整个河北省。

日本的吞噬目标是全华北，所以他们继续寻衅闹事，为制造亲日政权而大肆活动。“何梅协定”墨迹未干，6月27日就制造了炮打北京城的丰台事件。事件幕后总指挥是大特务土肥原，老巢在奉天。土肥原双管齐下：一手操纵黑龙会成员牛込富太郎，通过伪匪军头子王铁相策反在丰台的中国铁甲车队；一手唆使原吴佩孚的政务厅长、老牌汉奸白坚武收买铁甲车队。白坚武在日方指使下，为拼凑华北伪政权曾数次阴谋暗杀于学忠，并策动于的部下叛变，最后在沈阳成立了以分裂华北为目的的“正义社”和“正义军”。丰台铁甲车大队第六中队长段春泽原系石友三部下，由于石也是“正义社”成员，所以白坚武向段策反一拍即合。但是，1935年6月27日开始行动时，中国军队预有准备，尽管牛込富太郎和王铁相等人都已登上铁甲车，但见永定门紧闭，城门上布满守军，便慌忙向城内乱发十余炮，逃窜而去，暴乱以失败而告终。

1935年夏天，日本侵略者在华北虽然极其嚣张，但并未完全得逞。丰台事件的失败只是其一。为了实现华北的“特殊化”，

- ^①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日中事件的经过》，综合情报10之号外，1935年6月21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存。
- ^② 12日集结完了，共7个列车168节。见满铁《会社功绩概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存。

以“自治”为名网罗汉奸的活动，包括土肥原对吴佩孚、高桥坦对阎锡山和天津日军对宋哲元、孙传芳的策动，均未见效。因为华北事变，特别是《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人民的爱国反帝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还是中国投降派的卖国企图，都难遂所愿。但是日本的侵华狂人是不甘心的。1935年8月由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转任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少将，9月24在招待日本记者团的午餐会上，公然抛出强硬的爆炸性声明：要求“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把国民党部和国民政府全部排除出华北，使“华北明朗化”，为此不惜诉诸武力。此举不但震惊了中国，而且日本政府也出乎意料，因而不得不急忙统一对华政策。通过1935年9月27日至28日的四相会议和五相会议，被透露出来的对华“新政策”是，华北“目前不需要进行大手术的政治工作”。^①10月3日外务、陆军、海军三大臣所达成的谅解也明确要求中国：对日亲善、承认伪满和共同防共。^②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制止“华北自治”的阴谋。

1935年10月20日，上述对华“新政策”尚在传达贯彻，关东军大特务土肥原和松室孝良竟又制造了一场香河暴动。当天，由香河劣绅和日本浪人指挥，以要求减税为名，2千暴民冲城，形成“携带枪械之变民”与县警保卫团间的互击。翌日，又有23名日本宪兵乘车进城，“一时枪声四起”，全城大乱。^③暴动前劣绅和日本浪人曾要挟县长：让出县城，由民众自动组织县府。显然这是“华北自治”阴谋之一幕。虽然事属中国内政，但是中国的当权者、河北省主席商震却必须向外国驻军首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寻求所谓“根本解决办法”。^④

① 满铁《协和》杂志，1935年11月1日，157号。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下，303—304页。

③ 天津《大公报》，1935年10月25日。

④ 《北京日报》，1935年10月27日。

香河暴动问题尚未了结,1935年11月,关东军再一次对华进行军事威胁和讹诈,用兵之多和持续时间之长远超过6月那次行动。这是对中国宣布币制改革的反应。日本公然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实行以英国资本为后台、与英镑挂勾的通货体制。不过,关东军的武力恫嚇不单是针对币制改革的。日本侵略者认为,香河暴动和此次币制改革都更加形成“华北自治运动”的“气氛”。实际上“气氛”是阴谋者制造出来的。在11月12日关东军集结山海关之前,日方又提出“根绝”“排日机关”的要求;山海关陈兵之后,“华北自治”阴谋更加猖狂,无以复加,形形色色汉奸“自治”组织应运而生。11月25日,受日本人唆使的几百名流氓还围攻了在天津的河北省政府和公安局。11月27日,天津的华北驻屯军犹公然发表公告:“华北顷近之运动,乃因民众要求自治问题,故中国当局加以武力镇压实属徒劳。”^①就在这种“气氛”下,受日本唆使的汉奸殷汝耕^②,11月25日在通县拼凑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把冀东停战区的22县作为辖区,宣布脱离中央,实行“防共自治”。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时,集结在山海关的关东军也已完成撤退。

这种局面自然也是国民政府再次退让的结果。就在冀东伪政权出笼的几乎同时,12月18日国民政府在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置于中国一般行政区之外,实行自治性的管辖。这种迎合自然得到日方的欢心,说它“充满亲日反蒋气味”,“将与日本提携排除国民党等”。^③至于冀东傀儡,无非是日本侵略者手中的一个筹码。在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下,他们妄图用冀东傀儡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亲日化”。日本政府为此而制定的方针是

-
- ① 天津《益世报》,1935年11月27日。前此,11月20日日本驻南京大使有吉面见蒋介石,要求中央不要镇压华北“自治运动”。
- ② 殷汝耕,又名亦农,1885年生,浙江人,曾参加郭松龄反奉和浙江自治活动,《塘沽协定》后任蓟宝区督察专员。
- ③ 《满洲报》,1935年12月10日。

十分明确的：“一俟冀察的自治大体稳定时，则尽快促使”两个政权“合并”^①，并把“华北自治”扩大到华北五省，以实现其“华北国”的计划。然而，不久的历史发展表明，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黄粱梦。

(三)

广义言之，华北事变也应该包括察蒙事件。而关东军对那里的侵略也几乎是与九一八事变同时开始的。1932年关东军就派参谋田中玖窜到锡林郭勒盟对索王进行策动，还要求在乌珠穆沁设立特务机关。当时，关东军在多伦已设有特务机关，在锡盟庙冒充喇嘛的日本特务也已公开活动。1933年3月，关东军侵占热河和越过长城出兵华北时，虽然没有直接踏进察蒙，但是关东军所豢养和操纵的伪匪军却被命令窜入多伦一带。当时的部署是：由冈田大尉操纵的李际春伪匪军以锦州为基地侵入滦东；由山东土匪在开鲁一带啸聚而成的刘桂堂伪护国军从鲁北经林西侵入多伦一带，同一路还有原在通辽的拥有3000人马的李守信匪军。关东军利用伪匪军的窜扰，把对华北和对察蒙的侵略连接起来。为了更有效地操纵伪匪军使之充当马前卒，关东军竟以金钱为诱饵，伪匪军每前进一步就给支付一点钱款。从《塘沽协定》后，李守信的伪匪军一部分被改编为伪满兴安西警备军，李本人却以中将军衔当上了察东警备军司令官。这一支察东伪军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察蒙地区进行谋略的主要帮凶军。后来李守信竟成了伪蒙军总司令和伪蒙政权的主要头目之一。

德穆楚克栋鲁普原系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简称德王，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这位年轻的蒙古王公是狂热的民族分裂主义者，积极从事所谓“蒙古高度自治”的活动。

^① 1936年1月13日《华北处理大纲》，日本战史丛书《华北治安战》（1），5页。当时关东军特调伪满黑龙江省总务厅长永井四郎等8人，打入冀察委员会，进行监视和策动。

而锡察两盟又恰恰是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西侵的要冲，因而两者一拍即合。1934年秋，关东军驻天津特务头子土肥原亲自坐飞机赴苏尼特右旗活动。从此，德王一面保持与国民政府联系，一面与日本侵略者勾勾搭搭。1935年冬，德王在关东军的引诱下还亲自跑到伪满首都，面见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关东军表示愿意帮助他在内蒙西部先搞个所谓“独立局面”，继而成立“蒙古国”，还答应送钱送枪，以编建伪军。

在这之前，1935年初发生了察东事件。关东军本已在察东侵占多伦，但又无时不在得寸进尺。1935年1月，关东军声称察哈尔省沽源县属之长梁、乌尼河、南北石柱、永安堡、四道沟一带地方系伪满热河省丰宁县辖境，要求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西。当时那里已无中国正规部队。1月19日，关东军以丰宁县三好警务指导官所率领的警察和自卫队员遭到大滩南干顺店附近中国自卫团的袭击为借口，通过驻平武官向北平军委分会和政务委员会发出通牒：将对宋哲元军开始讨伐。实际上两天前驻承德的第七师团即组成了600人的所谓“讨伐队”。20日和21日，又有飞行中队、野炮中队和第十三旅团的全部兵力，经丰宁、大滩向沽源进发。1月23日关东军声称宋哲元军拒不撤退，向东栅子、沽源方面出动飞机^①，致使当地自卫团和居民死亡40余人^②。关东军如此兴师动众，大逞淫威，主要企图是打通多伦至沽源的交通线，占领西进要地。关东军本来并未同中国军队接战，无所谓胜败，可是国民政府也进行妥协，与日方举行所谓大滩会谈，签定所谓《大滩口约》。据此，此后中国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不得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③

①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察哈尔事件概要》，综合情报10第八号，1935年6月1日，特从伪都新京调3架重型轰炸机。

② 《国闻周报》，第十二卷五期，1935年1月。

③ 《大滩口约》，1935年2月2日由北平军委分会公布。

察东事件后，日伪在察东大设机关。李守信的察东伪警备军就是1935年3月在多伦设立司令部的。随之日本侵略者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也更加嚣张。1935年6月5日，德王同以商人自称的3个日本人从多伦到张北，日本人因无护照被守城卫兵扣留。于是日方说中国方面污辱日人，并以此为借口进行要挟。当时“何梅协定”甫将签定，6月27日，国民政府竟又由秦德纯与关东军的土肥原签定屈辱的《秦土协定》。宋哲元被迫交出察东六县行政权。从而由冀东“非武装区”到察东“非武装区”，形成了实际由关东军一手控制的伪满洲国同中国内陆的所谓“缓冲地带”。和冀东的情形一样，二十九军撤出后，张北、宝昌等察东6县名义上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实际上关东军命令驻多伦的李守信察东警备军第三师进行了占领。^①

张北事件后关东军更加紧张策动。1936年初德王便在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亲临下建立了伪蒙古军司令部。当时在德化已设有操纵伪蒙的特务机关。关东军的真意是，唆使德王建立伪蒙古军政府，而不能单是成立伪蒙古军司令部。因为冀东傀儡政权业已出笼，关东军急于在察蒙也造成同样的态势。1936年4月24日，终于促使索王出面，在乌珠穆沁旗召开了有关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等人参加的第一次蒙古大会。1936年5月12日，在关东军今村参谋副长等亲临下，正式成立伪蒙古军政府，云王、索王、沙王任正副主席，德王以总裁职位统揽大权。不过，实权掌握在以村谷彦治郎为首的顾问部，顾问部之上自然是关东军。伪军政府参谋长由总裁帮办李守信兼任。德王把李守信伪军、从伪满招募的兵、从锡察两盟招的兵合编为两个军8个师，德王本人和李守信分任第一、二军军长。

关东军为使伪蒙成为伪满的延长，极力以伪满影响伪蒙。因

^① 李伪军进犯沽源时，当地保安队曾奋起抵抗，击毙李军参谋长，但因关东军出动了飞机进行轰炸，保安队乃撤退。

此，伪蒙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再次飞赴“新京”，同伪满签定“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的《满蒙协定》。当时，正值伪满“废除”所谓治外法权，关东军与关东局达成协议，把原属关东局的200名警察派往内蒙，其中有的在张北特务机关指挥下，训练伪保安队。日本的蒙古善邻协会^①也以伪满洲国为基地，从1935年起分两路侵入锡察，以教育和医疗等手段欺骗、怀柔蒙古民族，搜集情报，充当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手足。

关东军和德王都不满足于锡察两盟的有限地盘。所以，接替田中玖任德化特务机关长的田中隆吉，在伪蒙军政府成立后积极策动伪蒙军西犯绥远。他利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制造伪满洲国的侵略经验，极力鼓动野心勃勃的德王等人。在他们看来，绥军不堪一击，只要西进，绥远唾手可得。伪蒙的两个军8个师当时已初步编定。对河套地区垂涎的王英匪帮，也在关东军指使下凑起“大汉义军”。按田中炮制的西攻计划，王英匪部在先，伪蒙军在后，把百灵庙作为后方军事基地。1936年11月5日，伪蒙突然向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发难，口实是绥蒙之间早已存在的税收等问题的摩擦。此后，不到10天便摆开阵势同傅作义兵戎相见。而且，田中隆吉还亲自坐在飞机上在空中盘旋指挥。然而，在国民党系统的军队中，傅作义部队的战斗力是闻名遐迩的。同时，在绥远不仅驻有傅部第三十五军，还有山西军支援，兵力倍于德王和王英的伪匪军。尤其王英匪军更是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进攻仁格时很快溃败。李守信派兵进驻商都接替王匪对抗傅部后，后方基地百灵庙迅速遭到傅军孙兰峰旅的袭击。守备百灵庙的是新编的战斗力极差的伪蒙军第二军第七师，日本顾问烟草

^① 1933年—1934年根据近卫文磨、荒木贞夫的旨意设立，以善邻之美名，专门对中国的蒙族和回族进行怀柔拉拢，妄图使其依附日本。1937年，为便于同伪蒙联系，东京的日本蒙古善邻协会分离出来独立的蒙古善邻协会，井上瑾中将将为会长，其活动尤为广泛。

谷命令死守。可是,当1936年11月23日傅部孙旅对百灵庙的攻击打响后,烟草顾问和特务机关长竟首先抱头鼠窜。傅军占领百灵庙后,王匪军妄图再逞,可是他在锡拉木伦庙的石玉山、金宪章两个旅,杀死日本顾问,起义反正。正当此时,“双十二”事变发生,傅军奉命停止前进。否则田中隆吉和德王等会失败得更惨。

自然,关东军指使伪蒙西犯也具有象征意义:日本侵略者正在悄悄地从阴谋“自治”转向武力夺取华北。这是历史因果转换发展的必然。1935年末,冀东和冀察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出现后,日本侵略者寄予很大希望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非但没有“亲日化”,相反“对日态度渐趋强硬”。^①所以,1936的日本华北侵略火药味更浓:一、自同年4月18日起,华北驻屯军主力由两个大队增加到两个联队,并成立隶属于驻屯军的步兵旅团司令部,此外还附有战车、骑兵、炮兵、工兵等部队;二、同年5月和8月关东军被授权,不但可以将部队部署在“长城线外近处”,而且一旦需要重大军事进攻时,必须“迅速果断行动”。^②由此可见,关东军敢于指挥伪蒙军武力西犯,不是偶然的。至于“双十二”事变,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爱国抗日运动,特别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升华,它预示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局面即将到来,从而为结束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始终被动挨打的悲惨历史作好准备。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① 冯玉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1936年8月12日在中央军官学校特训班的讲话。《冯在南京第一年》,上卷,485页。1937年5月,三户社印行。

② 1936年5月6日日本参谋总长《关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配置与任务的指示》,1936年8月2日《参谋次长就作战问题与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恳谈事项》。两文件均见〔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406页、587—588页。